

# 扎根乡土与呼应时代

## ——论陈果报告文学的地域性写作

□ 卫超群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等具有地域标识性的文学现象蓬勃兴起。地方性书写通过对特定地理空间的深描，为当代中国文学注入鲜活生命力，但同时也面临深层挑战。如何坚守地域特质避免符号化、景观化陷阱，如何从地域性抵达普遍性以反映时代精神、触及人类共同情感，成为作家探索的核心课题。四川雅安汉源籍作家陈果以十余年地域性书写实践给出了有价值的回应，其笔触聚焦大渡河峡谷、成昆铁路沿线等地，将地域风貌、时代精神深度交织。陈果的地域性写作为我们探寻了一条“扎根乡土、呼应时代”的可行路径，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探讨。

### 地域性书写的演进与形成

陈果 2010 至 2025 年间的报告文学创作呈现出清晰的地域化演进轨迹，勾勒出个体观察与时代记录交织的地域叙事深化路径。2010 年处女作《天梯之上》刻画了“云端小学”教师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十九年如一日的坚守，精准描摹了大渡河峡谷悬崖的险峻地貌与彝族乡村生活。《从伤口长出翅膀：芦山地震灾区重建一线实录》以全景式视角记录了 2013 年芦山地震后，灾区从废墟到重生的全过程。2018 至 2021 年，《古路之路》《在那高山上》等作品聚焦成昆铁路汉源站辐射区域，将悬崖地貌、彝族文化与脱贫攻坚等主题深度融合。2023 年《翻山记》拓展叙事视野至雅安周边，构建广阔地域叙事网络。2024 年《我从熊猫老家来——“CHINA 罗”丝路单骑法兰西》以雅安邓池沟为叙事起点，记录了退休职工罗维孝沿丝绸之路骑行的壮举，实现了地域叙事与跨文化叙事的有机衔接。2025 年《大地微光》收录 12 年创作成果，标志其地域性书写步入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成熟阶段。

陈果地域性书写的持续推进，源于文化自觉的驱动。作为土生土长的雅安汉源人，出生地的地理记忆与生活体验为其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础。在创作理念上，他曾明确将地域性书写视为个人的自觉选择与责任担当：“报告文学是一个更容易跨地区作业的文体，并因此容易对作者构成诱惑。坚持地方性书写，是个人情感的直观体现。你爱

她，因此愿意把时间花在她的身上，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种朴素的表达背后，是他对地域性书写的自觉担当，他将书写家乡视为作家的责任与使命，认为地域文学不仅是对本土文化的记录与保存，更是对地域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 地域空间的建构与当代精神的转化

陈果并非简单将地域作为叙事背景，而是以自然景观与人文符号为核心载体，构建立体可感的地域空间。他挖掘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西缘、川滇交界”的独特地理特征，将高山、峡谷等地貌与“雨城”气候特征转化为文学意象，并融入大熊猫、民族文化、成昆铁路等核心人文符号。《大地微光》中的夹金山藏家乐、雨城鸟岛等典型场景，使文本叙事空间与雅安地理空间精准互嵌。《乡村里的中国》以雅安为基点辐射多地，以雅安人文符号为精神纽带，构建起“有温度、有筋骨的中国乡村生态网”，形成独特的文学地理坐标。

陈果所建构的地域空间，与成都平原“安逸闲适”的巴蜀精神特质不同。雅安地处川藏、川滇公路的交汇处，其精神内核是多重地理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雅安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大渡河、青衣江穿境而过，高山峡谷的险峻地貌造就了当地人“与天争路”的坚韧底色；而“雨城”温润的气候、蒙顶山茶与汉源花椒的丰饶物产，又孕育了“于困境中寻生机”的乐观品格；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更使其地域精神兼具“坚守本土”与“包容共生”的双重特质，形成了区别于核心区域的文化张力。

这种精神特质在文本中通过地域语言得以彰显。陈果在作品中精准捕捉地方语言的独特质感，既保留“要得”“安逸”等巴蜀方言词汇，更融入彝族、藏族等民族语言元素。巴蜀方言与民族语言的交织，既还原了多民族聚居的交流场景，更通过口语化表达凸显人物性格，使地域语言成为精神气质的载体。

更重要的是，陈果挖掘了地域精神的当代价值。《古路之路》中村民“从无路中找路”的坚韧，正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地域精神的当代体现；《大成昆》中建设者铸就的“成昆精神”，是地域精神与国家建设相结合的生动写照；《听·见——芦山

地震重建故事》“从伤口中长出翅膀”的乐观与坚韧，彰显了地域精神在灾难面前的强大力量；《在那高山上》中“云端小学”教师李桂林、陆建芬夫妇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坚守，将地域“崇德尚实”的精神追求转化为新时代教育扶贫的责任担当。这证明地域精神是不断丰富内涵的文化基因，是对文化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时代性表达。

### 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的结合

报告文学需平衡真实性与文学性，陈果将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有机结合，形成独特的创作方法论。扎实的田野调查是其地域性书写真实性的基础，他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通过面对面访谈、长期追踪观察获取第一手素材。创作《听·见》时，他深入灾区与 36 位亲历者交流，挖掘复杂情感；《古路之路》创作的一年多时间，他经常到访古路村，沉浸式融入生活，累计行程数千公里，整理三大本原始采访笔记；《大成昆》筹备阶段，他用近一年时间收集、消化了近百万字的史料、工程档案等资料，厘清成昆铁路的建设脉络；在寻访过程中，他坚持深入铁路沿线的村寨、工地，两年多时间里与近百位建设者及家属深度对话，甚至为寻找沙马拉达隧道的亲历者历经波折，最终通过多方辗转获取关键素材。这种长时间、近距离的田野调查，使陈果的作品能够准确把握地域的细节特征，避免了地域书写中常见的“符号化”“刻板化”问题，为作品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陈果通过纪实边界内的艺术提升作品文学性。语言风格上，形成凝练质朴与灵动细腻的结合特色，摒弃套话宏词，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刻画场景与人物，如《在那高山上》直白描写二坪小学破败景象，用通俗表达让典型人物鲜活可感；《从伤口长出翅膀》以日记体实录重建过程，充满现场感。叙事结构与细节处理上，以人物故事切入宏大主题，如《大成昆》通过建设者手掌老茧、暴雨守护铁路等细节，将宏大工程转化为可感人物故事，实现历史现场感与文学审美性的统一。总体而言，这种“实”与“活”的平衡，为当代地域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 地方性与时代性的辩证张力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文

学面临“地方性消解”的困境：融入公共叙事时易丧失地域独特性，地域符号提炼表层化则难以实现与时代性的有机融合。陈果的作品以雅安及川西南区域为核心叙事场域，深度锚定地域文化根脉，同时勾连地域发展与国家时代主题，实现“以地域见国家，以小我映大我”的叙事效果。其核心融合路径是将地域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时代变迁相融合，以微观叙事折射宏大图景。《古路之路》通过古路村脱贫历程，具象呈现脱贫攻坚战略在川西南山区的落地；《听·见——芦山地震重建故事》以 36 位亲历者口述，将个体在灾难中的恐惧、重建中的坚韧与对未来的期盼，与灾后重建的时代进程深度融合，凝聚起“从废墟中站起”的集体精神力量；《大成昆》将建设者个人故事延伸至铁路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深远影响，呼应了国家民族团结、西部大开发的时代主题，使地域叙事具有了宏大的国家视野；《我从熊猫老家来》以雅安人罗维孝沿丝绸之路骑行至法兰西的壮举为叙事线索，将雅安大熊猫文化、丝路文化等地域符号与“一带一路”跨文化交流的时代潮流相融合；《大地微光》聚焦“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其故事分别呼应抗震救灾精神传承、生态保护等时代议题。

陈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使其书写兼具地域本真质感与时代脉搏。但挑战同样存在，如何避免“人民”概念化，捕捉个体生命独特质感与内在矛盾；其作品昂扬的基调是否过滤了地域现代化进程中复杂的矛盾与阵痛。对这类复杂性的适度触及，或许能增添历史厚重感与现实深刻性，这是对其洞察力与艺术勇气的深层考验。总体而言，陈果的实践表明，地域性书写的关键是找到地方经验与时代精神的“转换枢纽”——人的实践，当地域书写紧扣这一枢纽，地方性便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的深刻视角，时代性则成为浸润泥土气息的具体进程。

陈果的地域性书写为当代地域性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样本与理论启示，形成了个体观察与时代记录交织的深化路径，其背后是文化自觉的驱动；通过自然景观与人文符号融合构建具有辨识度的文学地理坐标，挖掘地域精神当代价值；以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的结合实现报告文学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平衡；以地方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为地域文学摆脱“地方性消解”困境提供有效路径，构建起“扎根乡土、呼应时代”的地域书写路径。

阅读《青春度》，泪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视线。让我情不自禁地写下这些文字，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一是女性视角下的多重叙事张力。在众多三线建设题材中，大多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业化叙事，而作者另辟蹊径，以浓墨重彩的妙笔书写了以女性为主体的物像群像，勾勒出三线建设历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医疗应急救援机动队的十二位女性，既是建设者，又是见证者。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她们可歌可泣的成长故事，有力地诠释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身处矿山、电厂、铁路、工地，其职业要求她们具备与男性同等的体力与勇气。例如，李雪雁与队友们搭草棚、下山背水，李雪雁冒险跳入金沙江救人，最终重伤。这些情节凸显了女性在极端环境下的生理与心理极限，同时也解构了“女性柔弱”的性别偏见。小说将性别差异转化为叙事动力，既呈现了女性突破桎梏的艰难，也讴歌了她们超越性别的坚韧。女性视角的一重张力体现在情感书写上。小说并未回避这些，李雪雁与高凤的爱情源于矿洞塌方，面临生死关头，高凤背着李雪雁闯过死亡线；邹珂萍与彭泽的爱情也是患难之情，当彭泽受重伤生命垂危之时，邹珂萍为其献了 500 毫升血，以及刘腊梅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皆细腻动人催人泪下。然而，这些情感始终与集体使命交织，私人情感的牺牲并未被简化为“奉献”的符号，而是通过具体的生动而令人泪目的细节，展现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伟大。同时，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身兼母亲身份，但三线建设的特殊环境迫使她

# 绽放的青春光华

## ——浅谈李吉顺长篇小说《青春度》的艺术特色

□ 党世根

们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做出抉择。王西丹为了工作而顾不上照顾儿子周小海，造成儿子失踪的悲剧；王晓月得与爱人见上一面，怀孕后在一次救援工作中流产；李雪雁为了投入到狮子山大爆破工程医疗急救之中，将儿子西西托付儿所照看，而她在救援中重伤住院，母子再相见时已然陌生……这些情节揭示了母性本能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撕裂。作者并未以道德评判简化这种冲突，而是通过人物内心的挣扎，呈现了时代加诸女性身上的复杂伦理困境。

二是人物塑造的立体化与符号化。《青春度》塑造了十二位性格鲜明的女性角色，她们既是独立的个体，又共同构成了一幅集体精神的拼图。他们有自己的爱和憎、喜和怒，有自己的丰富甚至复杂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那个特殊年代光彩而夺目的新人形象，这种群像塑造的成功，源于作者对人物立体化与符号化的平衡。每位角色均被赋予极具象征意义的外号，如“火凤凰”刘彩凤、“冷君君”王宝君、“翻江鱼”李雪雁。这些“外号”既是对其性格或经历的概括，也是集体记忆的符号化浓缩，使其获得了某种传奇色彩，成为三线精神的具象载体。小说还书写了

她们的创伤与成长弧光。其中的人物无一例外经历了肉体或精神的创伤：李雪雁父母牺牲、丈夫殉难、她左眼失明；刘彩凤丈夫牺牲、积劳成疾；赵春燕为救人殒命；张元香爱人坠崖……但这些创伤并未导向沉沦，而是成为人物成长的催化剂、动力源。人物的转变，成长正是通过一次次磨难和生死考验完成的。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小说中人物如何把创伤转化为信念和力量，使人物弧光饱满而真实。

三是自然意象与象征体系的构建。《青春度》的叙事空间集中于攀枝花的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狮子山、清风坡等自然地理符号，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象征体系和意象，承载着历史、命运与精神的隐喻。金沙江代表历史的洪流与生命的韧性；狮子山隐喻集体意志和生死考验完成的。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小说中人物如何把创伤转化为信念和力量，使人物弧光饱满而真实。

四是语言风格的时代烙印与美学追求。《青春度》的语言风格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美学自觉。作者文笔细腻而生动，充满了时代感。他用

丰富而形象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三线建设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物的情感与心理状态。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三线建设的艰苦与豪迈。小说注重语言注重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平衡。小说大量使用三线建设时期的特定词汇，并穿插真实历史文件的口吻等增强了文本的纪实感。与此同时，作者通过诗意的描写平衡了历史叙事的冷硬情景交融，形成抒情与叙事的共振。诗词歌谣与文本的情感表达，丰富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让人物形象更立体。小说的语言始终游走于悲愤与崇高之间。一方面，死亡与牺牲贯穿全篇，皆以冷峻的笔调呈现；另一方面，作者又以英雄主义的激情升华苦难，从而很好地处理悲剧意识与英雄主义的辩证并立，彰显对信念力量的礼赞。

《青春度》的故事虽然根植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但不是对历史的简单复刻，而是以虚构人物为纽带，将宏观历史转化为个体的生命经验。《青春度》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打开了三线建设这一尘封的历史篇章。通过女性群像的塑造、自然意象的隐喻，虚实交织的叙事，不仅还原了特殊年代的集体记忆，更挖掘了历史褶皱中的人性光辉。李雪雁们的“青春度”，是血与火的淬炼，是理想与信念的刻度，更是个体在宏大历史中寻找意义的艰难跋涉。在当代语境下，《青春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个人命运与时代使命碰撞，如何定义青春的价值？小说的回答是悲壮而充满希望的——正如金沙江的浪花终将汇入大海，个体的牺牲与奋斗，终将在集体的长河中绽放永恒的光芒。

清代诗论家沈德潜提出“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直指“诗品即人品”，以说明诗歌是诗人内心世界与精神人格的外化。富顺诗人周春文最近出版的诗集《纸上回声》，正是“襟抱”说的佐证。他秉持“第一等襟抱”，以乡村、乡情为主要题材，通过四大部分共 124 首诗作，重构乡土诗中人格化书写的新维度，将“襟抱”说理念立体呈现于诗集中。

### 人格的乡土根系与情感底色

在同类型乡土日常生活类诗歌中，相较于雷平阳笔下乡土的冷峻与伤痛，周春文侧重于从苦难中淬炼出生活的暖色。这种差异并非境界高下，而是诗人与乡土对话的声道分野。周春文长于将人情、乡情与自然融合，为性格中的温润注入情感温度，形成“以日常写人格，以人格暖日常”的独特风格。

诗人书写的亲情，是对古人“亲在则安、情守则暖”哲学内核的诗意阐发，也是他柴米油盐中的相守便是暖阳的立场。《故园》诗，摒弃大开大合的叙事情节，聚焦父亲的鼾声、母亲捻豆梗的专注、家禽归巢的规整等日常细节，勾勒出父母安详相守的画面，乡村闲适的亲情氛围扑面而来。在《庚子年母亲节低语》中，母亲的苍老、双手的老茧与房旁的坟冢，弥漫着岁月的沧桑。他见母亲时的无言动容，揭示了亲情相守、日常陪伴最是人间温暖。诗人认为，乡邻间的互慰互助是生命价值的重要组成，一句问候、一次同行，就是烟火人间的幸福时光。作品通过对邻里乡亲温馨互助、古镇时光游移的感知，折射出他潜意识里的处世之道。《菩提的力量》的冬日乡村，小姑娘在母亲笑脸旁蹦跳，小狗围在脚边，是诗人心中乡村日常的暖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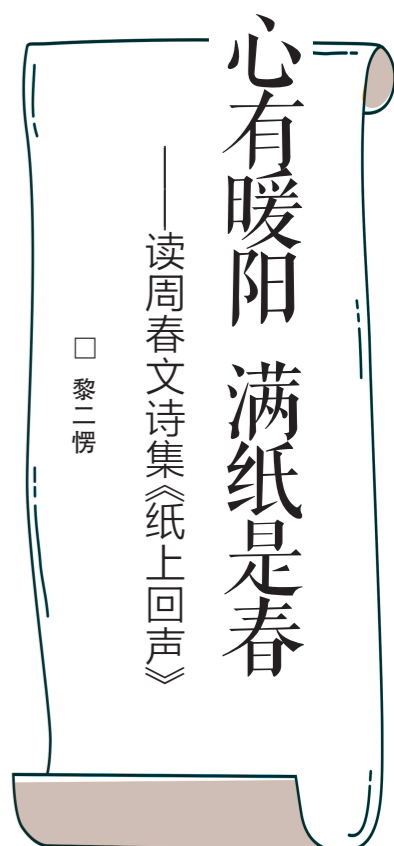
《在西塘：倒转的流水与世间的真相》中，“一棵树像一片遥远的森林 / 遮蔽守候在小巷的人们”，将江南水乡的远方，聚焦于小巷、摇橹、堤岸等细节里，强调守候与邻近如何构成个体与群体关系；熟悉的近处，是一种智慧。诗人相信，生命的回声最终来自那些与我们同一时空，同一日常的人与事。这种“近邻”，是对抗时间流逝、空间狭小的微小但又坚韧的力量。

### 从和解到共生的精神承转

诗人认为，对命运的“领受”，不是被动顺应，而是历经沧桑后主动选择的决然。相较于海子“面朝大海”理想主义的炽热，周春文更侧重于在现实冲突中恒守一种冷静。他诗中的平和，蕴含中年主体与命运对话后的隐忍。

诗人心中，一个人的快乐，是与自然、人群、社会适配、契合后的轻快与释然。他的诗大部分以亲缘为意象，在衷情、怡情和互情中获取一种亲切、和顺感，映现他内心经过岁月积淀后的大度。《沉默》中“把头埋下去 / 用手托腮”，是主动沉入内心、直面情绪的姿态。面对“模糊的身影、虚幻的人生”，诗人第一反应不是逃避或反击，而是暂停与凝视，并“不要急于抬起头来”。诗人将“沉默”视为一种蓄积和沉淀后的积极力量。“暗夜里有暖流涌动”暗示静能生发自我慰藉的动能。于此，即便生命成为“人迹罕至的枯槁”，也在“阳光正好”中静立。这是诗人豁达的核心要素：接纳遭遇的孤独与荒凉，才能发现生命的宁静与完美。

《无话可说》“把咬断的舌头和着血 / 吞进肚里”，传递语言失能、沟通无果时的痛感。但这种痛感在豁达碰撞后，实现了视角的调试和调度，将视线从人际的纠葛转向更广阔的时空：“天空的阴霾已走得很远了”“河流始终被大海吸引”。个人恩怨在岁月风雨和自然法则面前变得渺小，在“埋头走路，低头沉思”中忽视争执、回归自我耕耘。此处的接纳，即主动选择退让、沉默，并将能量投向更旷远。



《沱江月夜》“江水不语 身边是岸 / 岸上的风在窃窃私语，不知疲倦……内心的冷与脚步的慢 / 任江水濯洗过往流年”，诗人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勾勒沱江月夜的静谧。江水的静隐喻内心平和，风的动强化自然生机，岸是连接江水与陆地的轴心，象征身心的安稳与归宿，体现“物我相融即安然”的哲思。而“任江水濯洗过往流年”则是诗人不纠结过往、对不同命运欣然接纳的人格写照。诗人的这种意象构建，不是抽象哲学的直接转译，而是通过空间关系的交合，让感知具象化。

### 人格塑形的诗意呈现

《纸上回声》对豁达大度的人格书写，具有现代诗学“中年写作”的显著特征。诗人屏蔽了青年时期的凌厉与偏执，以通透审视人生，与陈敬容诗歌“中年的智慧在于取舍”的主张一致。但陈敬容的豁达多带古典主义的思辨，而周春文则将豁达隐藏于烟火叙事与自然镜像，显得真实、质朴、亲切，少了思辨的冷峻，多了人性的温馨。在《那一道山梁》“好多人都往走上走 / 我想，这是一次集体沉降……”，众人追逐的“山梁”，隐喻人们难弃的欲望，不随“集体沉降”，是诗人的从容与淡定。

诗人的通透豁达，根植于道家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天运楼前留个影》中，诗人站在隆昌天运楼前，闲看“运与限的距离才刚刚好”，不执着于“运势”的顺遂，也不迷茫于“陨落”的失意。这是诗人顺应时光游历、自然更迭，放下掌控欲，达成“顺应天道则内心从容”的清明与明澈。《在春雨里看见忧伤与迷惘》，以春雨为起点，通过一系列起伏不定而细腻入微的意象链接，凝视生命困境，自觉于广阔的时空转识，练就诗性的淡定、从容，在穿过“忧伤与迷惘”后，将自身灵魂安置于浩大时空。他承受冰冷、枯萎、消逝，而诗心却一直跟踪着风雨声，以感知生命的有限如雨坠地，无限如尘飘散，在历经无数创痛后，依然能与万物同呼吸共感。

《隐忍，是你投向远方的一缕温情》中的“踌躇”“慌张”“承重”，表达出人生的负重感。桥梁像“衣衫褴褛的农人”，传导出作为个体生命沉重的韧性。诗人视痛苦为“诉说着辽阔的念想”；“让石头说话”“让山川作答”是诗人向内的转化，并从中获得“一轮明月、一道篱笆墙 / 一段焐热的身子”。这些微小而具体的刻画，寓意豁达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负重前行，暗示我们应学会从微小事物中汲取温情，将“隐忍”转化为投向远方并且持续前行的能量。

相为心生，诗为心言。周春文在《纸上回声》里，以烟火映照人生，在亲情、乡邻间摄取生活和精神的暖意，实现他外相温润，心态平和、诗心淳厚的统一。他以日常为骨架，以人格为灵魂的书写，延续了乡土诗扎根生活日常的传统，又突破了普通乡土诗重乡情淡人格的局限，将个人“襟抱”与乡土情怀、传统哲学、现代诗学理念相融，为当代乡土诗的人格化书写提供了一种示范。

本版责编：张语婷